·金台书话·

生活好了，更要看看从前

□ 梁晓声

我的小说创作，从题材上基本可为分为两部分：一部分属于知青文学；另一部分大抵属于“当下”题材。

因为整理一些散文随笔，想到了从前许多事，比如年货、布票、肉票、洗澡票、户口簿、厕所等。我很感慨，中国确实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了，确实发展了，各种变化之大，不回头比较，印象是不够深刻的。现在普通饭店的任何一桌饭菜，过去北方家庭春节都吃不到。当时见不到鱼虾，鸡蛋、粉条都凭票，我直到下乡前才第一次吃到点心。这种生活并非城市最困难家庭独有，而是当时普遍现象。1990年，我在北京家里第一次洗到了热水澡。因此，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，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。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，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。

我的父亲是大三线建设工人，每隔几年才回一次家。我和两个弟弟上山下乡后，家里还剩下母亲、妹妹和患有精神病的哥哥，全靠小弟弟一人支撑，我想他承担的家庭重担比我们要多得多。正如秉昆入狱后，可以写出长长的名单让妻子去求助，弟弟和工友们的关系一直维系到他去世，这是由那个时代的生活形态造就的。他们这些留在城市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青年，在我们文学艺术画廊里近乎是沉默的、缺失的。

梁晓声　郭红松绘

当代许多作家都出身农村，写农村生活信手拈来，好作品数不胜数，如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而全面描写城市底层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相对较少。

少年时代，我就喜欢读有年代感的作品，比如《悲惨世界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等，但创作一部有较强年代感的作品十分困难，我也一直感到准备不足。到了六十七八岁，我觉得可以动笔，也必须动笔了。

我从小生活在城市，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生活；我曾写过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，比较熟悉知识分子、文艺界人士近50年来的心路历程；我与老革命式的干部也有过亲密接触。这几方面的熟悉，让我写起来不至于太不自信。我决定写一部年代跨度较长的小说，通过人物关系描绘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，从民间角度尽可能广泛地反映中国近50年来的发展图景，这就是《人世间》。

我不会电脑，只能手写，写第一页时不知道书名，但知道必须写到3000多页才能打住。有朋友提醒我，不要写那么长，最好写二三十万字，好定价、好销售，写那么长谁买谁出谁看？我说，这不是我考虑的，我只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。

令我欣慰的是，在115万字的《人世间》中，一些内容是其他小说中不常见的，一些人物是文学画廊中少有的，一些生活片段也不是仅靠创作经验编出来的。它们都源于我这个作家独特的生活积累，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。

我常常想，人类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？文学艺术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，更是让人类的心灵向善与美进化。

我曾写过一篇文章《论好人文化的意义》，不是说“老好人”，而是对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人。《人世间》里没有太坏的人，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总是干坏事。我总是在作品中挖掘、表现人物好的一面。这也是我对文学的理解。美国拍了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《动物园长的夫人》等一系列表现二战时期普通人见义勇为的影片。

其实，我们国家的好人很多，文艺作品中却好像都在表现斗争。

有两件事让我颇受刺激。一次，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，朋友的儿子正在看一部中国宫斗剧。朋友儿子问，为什么剧中人物都那么坏？朋友回答说，别相信，在我们国家人不是那样的。还有一次，一个中国朋友的孩子看一部外国电影《战马》。孩子说，妈妈，这几个人真好。孩子的妈妈说，别信，哪儿有什么好人。

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我们不再相信有好人了？其实就在我的小说《人世间》首发式前，午间新闻就报道了几件好人好事。其中一件是一辆大客车掉进了冰河，路过的吊车司机看到后紧急启动吊车，用高超的技术将困在客车中的人一个个救了上来。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和事。创作《人世间》时，我要求自己，应表现出多数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。创作完成后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无论周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我都不可能做坏人了。

作家是文学动物，而文学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，只能提供一些民间鲜活的、有质感的认知内容。若那些有信心、有能力、有干劲解决现实问题的人，偶尔也想通过文学来间接补充对民间的了解，而《人世间》又能起到一点儿这样的作用，作为作者，我自然也是高兴的。

这本书专为美而写

——读梁衡《天边物语》

□ 韩玉峰

虎年春节前夕，收到学者、散文家梁衡的《天边物语》。

梁衡自言：“我也常心存美的追求，想写一本笔记体散文，作一次美的实验，各美并存，兼收并蓄。一卷在手翻阅、把玩，百看不厌。”《天边物语》就是一本引导读者从“山川、器物、建筑、石刻、人事”中寻找“稀、奇、美、趣”的书。全书仅6万字，收文41篇、插图69幅，“公余饭后，挑灯烹茶”，读文赏图，尽入脑际眼帘。

梁衡擅长写“大事、大情、大理”。我读过他《大有大无周恩来》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?》这般黄钟大吕般的散文篇章，也读过《晋祠》《壶口瀑布》这样情景交融的美文，那么，《天边物语》想向读者诉说什么？

美术评论家贾方舟在代序《审美之旅》中认为：“《天边物语》以散文随笔的方式阐释作者的审美情怀和艺术见解。”

审美是人类的高境界，马克思说过“未来的人类都是审美的人”。梁衡在序中说，“我曾经说过‘文章为思想而写，为美而写’，而这本书专门是为美而写的”，“人间的日子除了温饱，还需要更美丽”。

梁衡文章所追求的美包括形境之美、情境之美、理境之美。形境之美娱人耳目，情境之美动人心怀，理境之美助人思辨。

形境之美在《天边物语》中比比皆是，“聊借画图怡倦眼”，那是《路边的钉头果》。情境之美也屡见不鲜，《秋色醉，旅人不须归》中，“秋天之好看，是因为大自然整整沉淀了一年的色彩和情感”。理境之美更为动人，能引起读者的感悟和思考，《一条大河消失了，一棵树却还在》，“树比河流更久长，因为它是一个活着的生命，在不停地采日月之精华，吐故纳新，暗记流年”。

《天边物语》书不厚，字不多，但是它是作家天南地北，走了多少路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的结晶。他到云南宾川县鸡足山寻访，30年撰成60万字游记的徐霞客在这里写下了最后一篇；他到贵州赫章县乌蒙山区写下“忽然眼前十万亩，紫花如海天外秋”的《高山韭菜坪》；他在江西横峰采访时发现了“立为一棵树，倒是一座桥”的奇景，这是《一树成桥》……

梁衡眼光敏锐、视野开阔，常怀报国之志、赤子之心，故寻到的多是大美。

在江苏淮安，梁衡见到周恩来少年读书处手植的腊梅，“现已逾百年，枝叶满园，高比屋肩”，念哲人其萎，作家感慨：“虽开国总理，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国土竟无一碑之立、一石之安，魂之所系不知何方，祭之所向一片空茫。”“噫，大道无形，大德无声。其大智、大勇、大德、大才、大貌，齐化作这株一品古梅遗爱在人间。”

梁衡的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?》一文，曾广为转载，并入选中学课本，2005年6月秋白就义70周年时又被刻在碑上立于纪念馆院中。梁衡来到常州，找到秋白的母校——觅渡桥小学，找到清嘉庆年间就有的觅渡桥，找到桥下的瞿家祠堂亦是秋白的故居，秋白当年就是踏过这座桥走上革命道路的。“念天地之悠悠，感时代之变迁”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，始终是作家梁衡心中割舍不下的念想。

梁衡来到晋、陕、蒙交界处的高寒岭，发现有一棵柏树树冠的剪影极像一幅中国版图。梁衡挖掘史料了解到，“宋王朝建立后这里是对夏、辽作战的前线，而后方供应基地却在河东，即现在的太原。朝野争论要不要撤掉这几个孤悬前沿的据点，皇上便派范仲淹、欧阳修前来调查。范、欧力主不撤，从此巩固了边防。”康熙年间，长城外有支准格尔蒙古部，时常南下侵城掠地，为此康熙亲率大军出征。“这一战彻底消灭了其首领葛尔丹，底定了中国现在的版图”，梁衡写道：“我信万事有缘，凡自然之物形有所异者，必是上天情有所寄、理有所寓。果然这棵柏树见证了千年来中国版图的演化。”

梁衡的《中华版图柏》发表后，当地抓住时机，建了一个“高寒岭人文森林公园”，筑“范欧亭”，立康熙铜像，山上遍植牡丹，向游人开放。这棵翠柏矗立山巅，一遍遍向人们讲述着中国版图形成的故事。

·淘书之乐·

□ 徐永鹏

10年前的一个春天，喜欢读书的我去新华书店买书，忽然发现书店旁的空地上多了一个旧书摊。

出于好奇，我上前观看。摆书摊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，书摊上除1949后出版的书外，还有几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课本，且品相完好。我问他多少钱，他说2元一本，我十分高兴，掏出10元钱买下一本《国文》和一套4册的《白话本国史》。

打这以后，我上新华书店时，总不忘到旧书摊转转，看到中意的就买下。一来二去，老爷子和我熟了，收购到好书都特意为我留着。

一次，他收了一本清代的《同学录》，问我要不要。这本宣统年间江南高等学堂的同学录，不是由校方或官方出资印刷，而是由一位名叫姜澧兰（号廷荣，江苏武进人）的学生出资汇刻的，很是难得。虽不是文人墨客的著述，但从汇集众多学生的名单，可以了解到学生的籍贯分布以及名人学籍。同时，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历史、地理方面的资料， 特别是清代末期省的划分、府州的设置、县的归属等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我一看就十分喜欢，没还价就花20元买了下来。在我看来，它对研究清代学堂史大有裨益，其价值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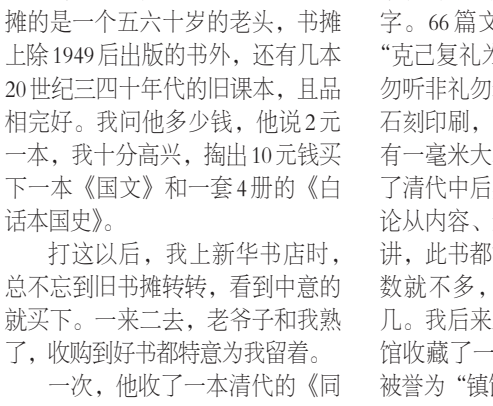
有了这次特别的收获后，我就把收藏的重点放在了古旧书上。有些朋友听说我爱好淘古旧书很不理解，觉得淘那些纸页发黄、外形破损的书没情趣，但是我却乐在此中。10年来，通过各种途径已购得上百种。

这些书包括历史、经学、文学、碑帖、教科书等。从时间上讲，最早的有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的，最近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一些书局出版的。这些书，有的还在再版，如《古文观止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；有的已不再版，甚至成为珍品。

在淘到的所有古书中，最让我钟情的是一本清代出版的《四书五经义大全》之卷三《论语》袖珍本，书长7.5厘米，宽5厘米，只比普通的火柴盒大一点。

此书是清中期科举考试考生作弊用书，共计30页，正反面都有字，每页约540字，全册约3.2万字。66篇文章均无作者，题目有“克己复礼为仁义”“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义”等。书用白宣纸石刻印刷，字体细小如蝇，每字只有一毫米大小，但十分清晰，反映了清代中后期高超的印刷技术。无论从内容、形制，还是印刷技术来讲，此书都富有收藏价值，当时印数就不多，流传至今更是寥寥无几。我后来发现，江苏省南京博物馆收藏了一本与我这本相仿的书，被誉为“镇馆之宝”，而我当时只化1000元就从旧书摊上淘得，说明经多年锤炼，我收藏旧书的眼光已颇具功力。

收藏古书虽然费时费钱，但益处不少。首先，收藏的过程也是读书的过程，我读到许多如今不易看到的好书，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学识。比如我收藏了一本清光绪癸卯年出版的《读史论略》，通读了一遍后，对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了大致的了解，并能知悉前人对此的评价，提高了我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认知。其次，收藏古书是一种收益较高的投资。许多古书我购买时只要几元钱，最多的一本才上千元，可如今这些书最高的价值上万元（如清代“袖珍书”《论语》），最低的也可卖几十元一本，投资回报率很高。



天津旧书市场的淘书者　　图片来自**百度**

不过我从开始淘旧书到现在，从不以投资回报作为衡量标准。在我看来，淘书本身已让我身心愉悦，这种乐趣，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。

《美国和古巴关系史纲》出版

本报电（任睿明）新近出版的《美国和古巴关系史纲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）通过对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述，分析美国历届政府对古巴的政策以及古巴独立后与美国关系的演变，力图勾勒出世界超级大国与近邻古巴近200年来恩怨关系的轮廓，是国内学界第一部专门研究和论述美古关系的专著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。

作者徐世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。他是最早留学古巴的中国青年学子之一，有幸近距离结识埃内斯托·切·格瓦拉、菲德尔·卡斯特罗和乌戈·查韦斯，是拉美地区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，其著述不仅具有学术严谨性，还有一般国际关系史著作罕有的生动性、鲜活性。

用立体书诠释空间站

本报电（胡志）近日，由中国航天一线青年科学家团队打造的原创立体书《繁星作伴好还乡：空间站全景立体书》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。该书用立体工艺为读者真实还原了中国空间站的内外构造，将系统工程思维与科学逻辑融会其中，通俗易懂地讲解了航天器的科学原理，展现了大国重器的力量。

该书共8个板块，全景展示了火箭升空、宇航员训练、空间站结构、舱外工作、宇航员生活和空间站的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系列硬核知识，可以说是一本空间站的立体小百科。书的前后封是立体结构的一部分，没有固定书脊，可两边开合，拉伸即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站模型。随书附赠的手工包，可以拼装出一个“载人飞船”与空间站对接，给读者带来直观的科普体验。

图书价格须规范化管理

□ 何勇海

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《出版业“十四五”时期发展规划》，提及推动制定相关法规规章的计划，其中包括业内人士已呼吁多年的图书价格的管理与规范。《规划》提出：加强出版物价格监督管理，推动图书价格立法，有效制止网上网下出版物销售恶性“价格战”，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
推动图书价格立法是图书出版行业多年以来的愿望，与此同时，也伴随着反对以立法形式干预图书价格的声音。反对者认为，我国图书市场已形成参与者广泛、竞争程度充分的格局，价格问题是市场问题，应交由市场来决定，由市场来优胜劣汰；而且，立法制止图书销售搞“价格战”，会增加读者的购书成本，是变相损害消费者的利益。

实际上，推动图书价格立法，并不是要禁止图书市场进行正常的竞争，而是要消除过度竞争、恶性竞争、自杀式竞争。有专家早就指出，市场经济离不开竞争；但是，当竞争所造成的行业经济损失大于由竞争所获得的行业经济利益时，竞争就是过度的、恶性的、自杀式的、毁灭性的、破坏性的，反而会阻碍行业发展，劣汰优也汰，谁都过不好，这种竞争需要深入反思和彻底改变。

去年9月，网红主播刘媛媛开启亿元专场直播，号称“喊来了中国出版社的半壁江山”，并在预告中标明准备了50万册破价到10元以下的书以及10万册1元的书。上半场刘媛媛直播间共上架124个图书文娱类商品，其中售价10元以下的产品共有58个，占比接近50%。这场直播随即引来业内人士担忧和质疑：10元乃至1元一本的图书，出版社的利润从何而来?

有人算了一笔账，对于直播卖书来说，成本包含了图书本身的版权与印制成本、物流的成本、主播的佣金分成、客服人力的支出等，无论怎么算，都很难算出10元以下的正版图书如何拥有利润空间，更遑论1元图书了。业内人士称，网红“破价”直播，严重扰乱图书出版行业的经营发展秩序。

除了“破价”直播卖书，近年来图书行业还有一个奇怪现象：新书刚上市甚至尚在预订，电商就打起“折扣战”，有的还是“自杀式打折”。据说平台卖书只是为了挣名引流，卖其他商品才为赚钱，实体书店和出版机构的利益则成为“炮灰”。新书打折尤其会挫伤作者的创作热情。新书刚出版就打折，给读者造成图书本身水平低的错觉，影响图书未来的销售。

图书业各色恶性“价格战”，对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来说也非好事。图书被“恶意砸价”，会倒逼难以获得正常利润的出版社抬高书价，以分摊编辑、管理、人工、版税等诸多固定成本，引起图书定价虚高，让读者更加望而生畏，因为只有“高定价”才能玩“低折扣”。在提高定价同时，出版社还会缩短出版周期，搞同质化、跟风化出版，降低图书整体质量，力求周转快，薄利多销，使得图书业难以高质量发展。只有当读者以内容质量好坏而不是价格折扣高低作为购买的标准，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更多的精品图书出版。

因此，在图书市场失序、生态失衡情况下，推动图书价格的规范化管理，建立合理的图书定价体系，刻不容缓。比如规定，新书在出版一年内不得以低于其定价的几折销售，线上线下折扣一致等。倘若图书价格能规范化管理，书价的确定、恶意“价格战”处置等，也就有法可依。创作者、出版商、实体书店则多了道保护屏障，可以精心打磨、从容推广，有助于图书出版市场、文化产业更加规范地发展。

·读者之声·